心理安全感于个体与群体中的差异及共性

—— 人类发展视角的启示[a]

韩书　尹彬*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摘 要　人们习惯于做出危险伤害的预防行为，防患于未然以获得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身体或心理的威胁或风险的感知预测，是一种心理状态，并通过认知、情感、行为、生理状态等表现出来。近年来，心理安全感的研究逐渐成为心理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事件、组织管理和社会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在人类发展领域，研究者们尚未充分关注心理安全感，并存在对于其在人类演化发展历史上的理解和干预方法的研究不足。因此，本文通过对文献的回顾与思考，基于人类发展的视角，聚焦于心理安全感于个体与群体中的差异及共性，来探索和深入对心理安全感的理解。具体而言，经族群早期生存环境筛选的遗传基因以及个人发展经历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个体在面对事件时的压力感受性和应对方式不同，进而产生了心理安全感的个体差异；而在群体中，环境、文化和基因的相互作用引发了人们在思维模式和行为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心理安全感的群体差异。此外，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在心理安全感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集体记忆、文化符号赋予成员共享的框架和意义，用于理解环境并产生认知层面的心理安全感；另一方面，与群体积极的互动形成的归属感、凝聚力、文化依恋等情感纽带，带来情感层面的心理安全感。综上，本文以人类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心理安全感，并将其应用于亲密关系、家庭教育、组织领导以及应急预防等多种环境中，以实现维护心理安全感、提升生活质量、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多元化与包容性的心理学目标。

关键词　心理安全感，人类发展，个体差异，群体差异，多元化与包容性

[a]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面向大学生心理安全大数据的预警模型及应用研究》（U1805263）的资助。

*通讯作者 Email：byin@fjnu.edu.cn

1 引言

“谨慎捕千秋，小心驶万年”。自古以来，人类都有着高度的警觉性，时刻监控着身边的环境，以确保自己身处在一个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在生活中，人们选择住在犯罪率较低，且邻里关系和睦的社区，并为家中安装防盗门窗，以防范潜在的安全威胁。同样，在社交和职业环境中，人们总是小心翼翼，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和言论，以防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在如今信息化的社会，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时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Kraus et al., 2017)。此外，人工智能给人们的工作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让许多人倍感压力。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还会进行体育锻炼、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系好安全带，并积极参与各种疫苗接种活动。这些举措无一不反映了人类对心理安全的渴求 (Hart, 2014)。

安全感指的是人们在心理上远离恐惧和焦虑，感到安全和自由的状态 (Maslow, 194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公众的关注，尤其是在政治、组织管理、社会心理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社会动荡、恐怖袭击和战争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安全感 (Jacobson & Bar-Tal, 1995; Cammett et al., 2022)。在组织领域，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团队氛围可以使员工更加自信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Edmondson, 1999; Edmondson & Lei, 2014; Chen et al., 2022)，对工作更有热情 (Yagil & Luria, 2010)。而在社交领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维护心理安全的重要因素 (Yang et al., 2022)，而与伴侣的关系质量直接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安全感 (Arriaga & Kumashiro, 2019; Feeney & Fitzgerald, 2019)。此外，社交距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安全的指标。人类会调节个人的社交距离 (Hall, 1966)，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建立起小保护圈以维护个人空间和界限，当感到自己的空间受到尊重和保护时，才更感到安全自在。特别是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社交距离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突显 (Oosterhoff et al., 2020; Pedersen & Favero, 2020)。如今，心理安全感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集合了许多现代认知的复杂体系，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各个阶段应对不同的挑战，创造出新的安全感体验(Zotova & Karapetyan, 2018)。尽管心理安全感在组织领导、工作环境和社会心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从近年来联合国所提倡的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的角度看，它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 心理安全感及其理论解释

2.1 心理安全感的概念内涵

心理安全感这一概念与其他多个相关概念，如“安全”、“安全感”、“安全感知”和“心理安全”等词汇，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早期，安全即逃离危险情境或境地，成功地回避威胁意味着安全，这种安全涉及到身体、心理、社会等多个层面的保护，是一种客观的情境。后来，安全（Safety）被定义为当下或未来对生存的可能性的感知 (Tashjian et al., 2021)，其主观感受的成分即安全感。Edmondson (1999) 将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afety）应用于工作组织领域的研究中，她将心理安全定义为个体在工作环境中感到被接纳、被支持、可以自由表达观点的心理状态，特别强调员工在工作中的情感安全与信任。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受，特别是满足一个人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受(Maslow, 1942)。安全感作为内在的心理资源，帮助个体处理信息、调节刺激反应，调动社会支持、提高幸福感 (Melanie, 2011)。相反，不安全感是对外部环境的感觉和认知，涉及对环境的评估和对应对方式的评估 (Lazarus & Folkman, 1987)，也就是对环境中不安全信息的感知。然而事实上，“安全感知”（Perceived Safety）和“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是两个独特的概念。安全感知侧重于个体对周围环境安全或威胁的感知、判断和评价，属于一种心理过程或心理机制；而心理安全感则强调个体对自身状态的感受，是一种主观信念，是对环境感知的结果与效价。对个体而言，安全感知这一心理过程是共同的，涉及感知行动、信息评估 (Rogers, 1975; Tashjian et al., 2021) ；然而，心理安全感的程度却因人而异 (Jacobson & Bar-Tal, 1995)。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研究者针对心理安全感提出了更加本土化的定义，即心理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身体或心理的威胁或风险的预期，涉及应对事件处置时的确定感和可控制感 (安莉娟，丛中，2003)。人际安全感和控制确定感是中国人心理安全感的两个子维度，前者反映个体对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安全体验；后者反映个体对于生活的预测和确定感、控制感 (丛中，安莉娟，2004)。

在本文中，我们将所讨论的概念——心理安全感，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对环境及风险感知后的心理状态，是一种主观体验，通过认知、情感、行为、生理等表现出来。依据修订版的马斯洛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 (曹中平 等., 2010)，我们可以从自我安全感、情绪安全感、人际安全感三个方面展示心理安全感的维度以及表现（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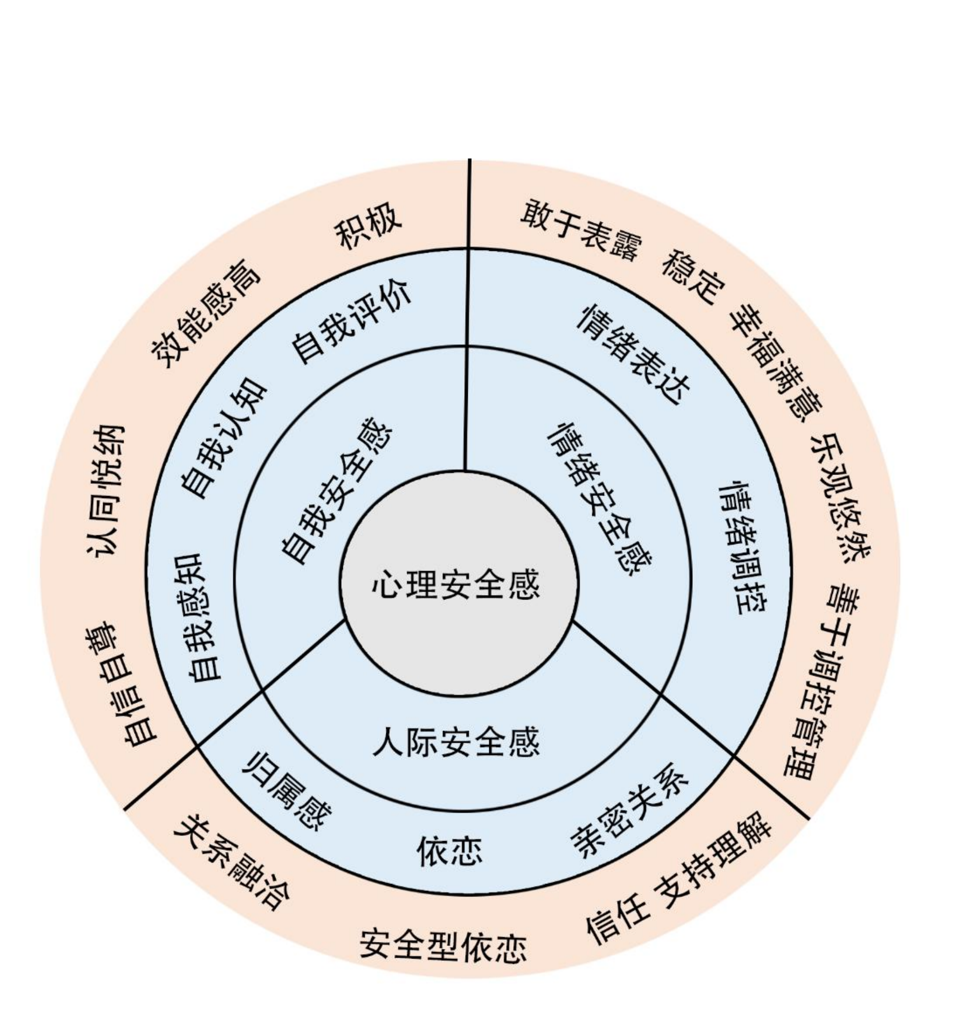


图 1 心理安全感的内在结构以及外在表现

图注：蓝色部分表示心理安全感的三个内在结构，粉色部分表示心理安全感在相应结构上的表现。

2.2 与心理安全感有关的理论研究

在心理学史上，对安全感的描述可见诸众多理论学派中。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不安全感的来源是个人的需求和欲望得不到满足，遭到了忽视；人本主义认为安全感是一种缺失性需要，将安全感置于人的本性需求和人的福祉方面去考虑；认知心理学认为心理安全感是一种心理状态，可以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除了心理学领域中的不同流派，学者们还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理论来理解安全感。我们梳理了解释安全感的相关的既有理论，并从目的，内容和应用三个方面探讨了每个理论（表 1）。

表 1 与心理安全感相关的的既有理论

作者	理论模型	目的	内容	应用
Rogers (1975); Maddux & Rogers (1983)	保护性动机理论	旨在解析人们在面对恐惧信息时的心理过程和应对行为，并提供了一种解释恐惧信息如何影响态度变化的框架	信息接收者从接收到来自环境或者个人内部的信息（信息源）开始，就对信息进行了评估（认知中介过程），并最终确定采取对该信息的应对模式。认知中介过程包括威胁评估（对事件、条件或情况的评估，判断其是否构成威胁或危险）以及应对评估（关注可用的防御措施、应对危险的信念），经评估形成保护性动机	主要用于健康、安全相关行为的预测和干预，例如医疗保健、环境科学、信息安全、旅游管理等领域中的健康保护行为
Crick & Dodge (1994); Lemerise & Arsenio (2000); Ziv & Hadad (2021)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	旨在理解社会反映的根源的心理过程，即信息处理	社会信息的处理过程主要包括编码社会线索、对线索进行解释、分类目标、反应提取与决策、行为实施几个阶段；个体的认知结构、早期经历和信息处理步骤相互关联的，共同塑造了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认知和行为	用于攻击行为，社会交往
Mobbs et al. (2020); Tashjian et al. (2021)	安全决策模型	从决策神经科学的框架来理解人脑如何计算安全，做出安全决策的	安全决策依赖于威胁导向的评估和自我导向的评估的相互作用。前者包括威胁的价值、迫切性、可预测性，后者包括个人经验、应对策略和对局势的控制力。这两部分的解释相互交织并加权，产生了安全决策	用于安全学习，恐惧抑制，恐惧调节
Young (1999); Young et al. (2003)	图式治疗理论	在传统认知行为疗法的基础上，结合依恋理论等形成的整合治疗模型，旨在以图式疗法治疗人格障碍	个体的记忆系统中存储了关于某一事件过去固有经验的认知反应，影响了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在童年、青少年时期，由于创伤（如缺乏感情、拒绝和挫折）或者过度保护等有害的经历，个体形成了早期适应不良的图式并贯穿一生。在成年期，面对与最初的创伤相似的情境，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不安全的图式可能	主要用于心理治疗，如在人格障碍、情感障碍，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中，干预修复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在依恋中，用于依恋安全启动

			被激活，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	
Hart et al. (2005); Hart (2014)	心理安全感的三元模型	提供一个关于防御的整合的安全系统理论，解释人们如何维持心理安全感	依恋、自尊、世界观为个体在面对心理威胁时提供了心理安慰，具有防御功能。自尊是自我概念层面的心理安全感；依恋是人际层面的心理安全感；世界观对应于价值层面的心理安全感。三个维度构成了动态的相互关联的安全系统，对安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威胁会导致其他组成部分的补偿性防御激活	没有明确提到，可用于衡量心理安全感的水平
Blascovich & Tomaka (1996); Blascovich & Mendes (2000); Blascovich et al. (2004)	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提供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测试生理唤醒与行为的关系	融入情绪，聚焦于对挑战和威胁的评估。当认为自身有足够的资源满足任务需求时，预计会出现挑战状态；当认为自身的资源不足以满足任务的要求时，就会出现威胁状态。评估通常是无意识的，挑战或威胁状态，通过不同的神经内分泌和心血管反应模式客观反映出来	主要用于压力情境下的绩效与决策（威胁-挑战），技能表现的个体差异，例如，体育竞技，警察执勤、社会促进效应
Dickerson et al. (2004); Dickerson & Kemeny (2004)	社会自我保护理论	旨在阐述情绪、心理、生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即与社会自我相关的威胁会诱发心理生理反应	个体有特定的生物系统以在社会环境中维持保护社会自我，监测环境对一个人的社会尊重或社会地位的威胁，并协调心理、生理和行为反应来应对这种威胁。社会心理应激因素，导致皮质醇的增加和其他生理参数的变化	社会性威胁评价时的反应与策略，如女性身体形象威胁
Slavich (2020); Slavich (2022)	社会安全理论	旨在解释大脑和免疫系统如何实现进化的适应性以避免社会威胁，发展和维持友好的社会关系纽带	人类的大脑和免疫系统主要是为了保护生物体的安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脑和免疫系统经过不断进化，可以监控环境，探测威胁，产生预期的行为反应	主要用于社会负面因素导致的健康差异，如人际冲突、生活压力、社会威胁、疫情

从上述梳理中可知，目前有关安全感的理论主要集中在认知的观点上。其中，保护性动机理论、社会信息处理理论、安全决策模型以及图式治疗等理论，聚焦于对环境、对信息的感知、判断、评价等加工处理过程，也就是“威胁/安全感知”的心理机制。此外，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社会自我保护理论和社会安全理论等，在认知评估的基础上融合了生物的进化的因素，考虑了在威胁或安全状态下的生理反应。而心理安全感的三元模型则强调了维持心理安全感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安全感知”和“心理安全感”这两个独特的概念提供了有益启示。

然而相比之下，心理安全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个体、群体之间心理安全感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个人而言，个体的社会背景和特征影响着心理安全感。例如，女性比男性报告更多的不安全感 (Marzo et al., 2021)；低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报告更多的不安全感 (Bar-Tal & Jacobson, 1998)；其他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出生顺序、兄弟姐妹数量），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经历等可能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安全感 (Wang et al., 2009)。研究表明，儿童的心理安全感可以由他们对学校、家庭和附近地区的不同感知和评价所预测 (González-Carrasco et al., 2019)。在群体层面上，一项涵盖来自 13 个国家的普通成年人群的研究，调查了在全球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心理困扰和心理健康程度 (Marzo et al., 2021)。研究结果显示，越南人口报告心理困扰的几率最高，其次是埃及，而尼泊尔的心理困扰程度最低。这种差异可能与 COVID-19 爆发初期错误虚假信息的传播相关，导致人们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在越南得更为严重。此外，不同社会等级的群体心理安全感的表现也不同 (Harrington, 2017)。与中产阶级的工作相比，工人阶级面临更大的威胁，工作和生活往往受到各种情况的限制，他们更有可能陷入债务、失业和贫穷的困境。同样，随着社会变迁，群体心理安全感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中国学生群体在人际安全感、信任感、确定性方面的安全感在逐年下降 (Zhang & Zhao, 202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出现了“城市居民心理安全”这一新概念 (Wang et al., 2019)。

同时，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安全感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与发展过程，在生存繁衍的压力下，逐渐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心理和行为机制。个体的注意力会抑制与处理威胁无关的行为，优先注意到威胁性刺激物（愤怒的脸、蛇或蜘蛛等危险动物）(Neuberg & Schaller, 2004)；面对威胁且缺乏安全信号时，防御系统被激活 (Gilbert, 1993)；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个体积极主动地回避或战斗 (Sangha et al., 2020)，以及伪装、使用保护色 (Stevens & Merilaita, 2009) 等防御策略；合作建立社会纽带，共同抵御外部威胁 (Baumeister & Leary, 1995)；依恋系统驱使个体寻求依恋对象的照顾与保护，依恋模式伴随一生，成年后的依恋对象扩展到更大的关系网络 (Mikulincer & Shaver, 2017)。这些存在于我们遗传信息中的信号模式，也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心理安全感的演化发展历程。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仍然存在着对心理安全感在人类演化发展历史上的理解和针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安全感的识别、维护和提升方法上的研究不足。Tinbergen (1963) 认为，理解行为需要整合机制与功能的研究，从近因（关注因果关系和发展）和远因（关注适应价值和进化传承）理解行为。远端层面强调个体与环境的适应协调，解释行为如何被进化选择以赋予的特定的基因信息，而近端层面描述生物倾向和心理机制，解释行为如何运作 (Mayr, 1961)。Hofmann 等人(2014)曾提供了一个综合的社会行为演化分析的框架，涵盖了生态、社会环境等外部属性，以及神经分子、生活史特征等内部属性。本文通过对文献的回顾与思考，旨在基人类发展的视角，聚焦于心理安全感于个体与群体中的差异及共性，结合生态地理、生物基因、文化适应、个体经验等方面，来探索和深入对心理安全感的理解。

3 心理安全感的群体内差异：基因与经历的相互作用

心理安全感是人类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它涉及个体与其所处的背景的相互作用。正如生态系统理论 (Bronfenbrenner, 1992)，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影响了心理发展和行为表现。环境经历可以重新编辑大脑结构网络，实现大脑的可塑性 (Chen & Baram, 2016; Maya-Vetencourt & Origlia, 2012)。遗传、环境、发育和表观遗传等多个过程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个体的行为表现和表型特征 (O'Connell & Hofmann, 2011)。因此，对于同一群体中个体，由于遗传基因以及后天经历的不同，产生心理安全感的个体差异（图 2）。我们结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来解析心理安全感个体差异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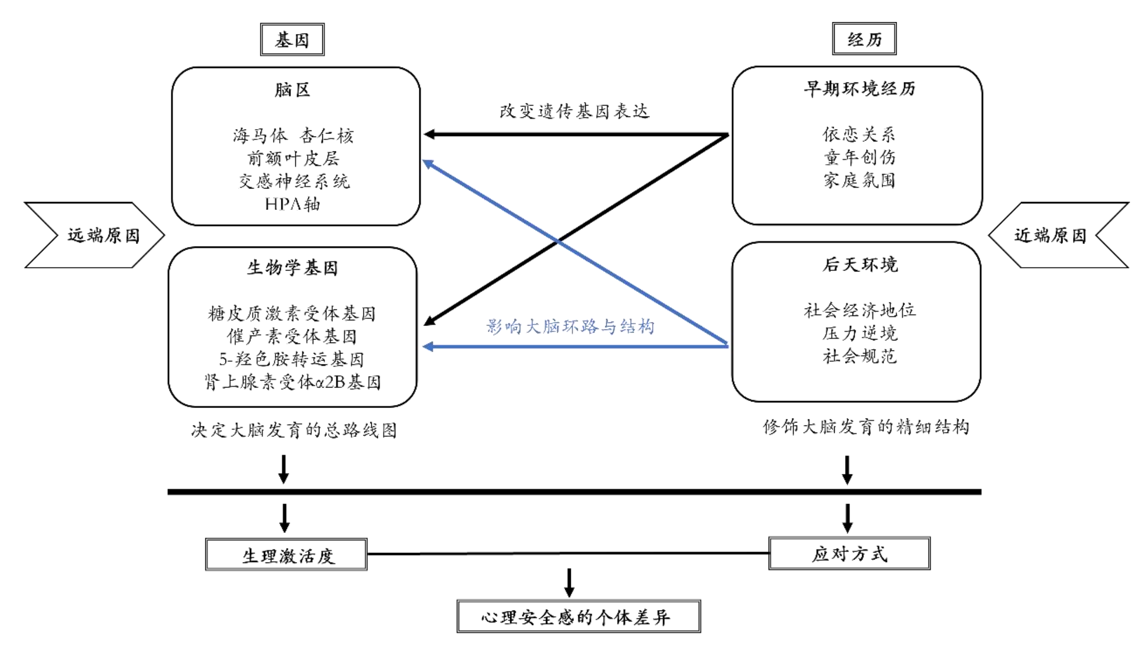


图 2 心理安全感的群体内差异及其产生机制

图注：心理安全感的产生源于远端的演化生物学机制和近端的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远端原因中，为了应对生存和繁衍的挑战，通过演化过程，人类的大脑发育出了专门负责监测环境和感知威胁的结构，而特定的受体编辑基因则是对这些威胁的生物学响应。近端原因则主要包括个体的早期环境经历和成长环境条件，它们对大脑发育的微观结构产生影响，进一步塑造心理安全感的差异化应答。经历早期生存环境筛选的遗传基因和个人发展经历的差异会影响个体在面对特定事件时的生理激活程度和应对策略，从而产生不同水平的心理安全感。这种差异性展示了心理安全感在群体内的多样性。

3.1 心理安全感的神经基础：适应性大脑结构

人类社会认知有着很强的系统发育的起源 (Sallet, 2022)。在演化发展的过程中，大脑承担着适应环境和进化的责任，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和群体生活，大脑建立起了与社会认知相关的神经环路，主要集中于眶额叶皮质、前额叶皮质、颞上回以及杏仁复合体等脑区，来感知和处理社会相关线索的信息 (Fernández et al., 2018)，也称为“社会脑”。社会脑假说认为，社会的复杂性与物种的大脑皮质层体积的大小相关 (Dunbar, 2012)，生活在较大社会群体中的物种比生活在较小群体中的物种具有更大的新皮层比例 (Sandel et al., 2016)。此外，行为创新、社会学习能力，使用工具的能力也促进了大脑容量的增加 (Reader & Laland, 2002)。

为了在危险环境中生存，在安全的环境中促进社会互动和社会联系，哺乳动物神经系统朝着适应战斗-逃跑和社会参与行为的方向发展 (Porges & Furman, 2011)。潜在危险评估环路的神经解剖学基础由几个相互连接的边缘区域组成，这些区域对处理动机刺激至关重要:海马体、杏仁核、终纹床核和内侧眶前额皮质 (Szechtman & Woody, 2004)，是防御动机和情感激活的关键中转站。杏仁核是与恐惧相关的刺激的监测器 (Sander et al., 2003)，是识别迫在眉睫的威胁和激活防御反应的综合中枢，可以快速触发与威胁和危险相关的心理状态，面对压力缺乏安全感时会表现出杏仁核活动的增加 (Mikulincer & Shaver, 2019)。最近的观点认为，威胁可以经由皮层下和皮层回路同时进行处理 (LeDoux, 2017)。当面临威胁时，以杏仁核为核心的皮层下防御生存回路会激活防御性行为；工作记忆底层的皮层（主要是前额叶）认知回路则产生有意识的恐惧体验。也就是说，面对威胁时有意识的恐惧感觉是工作记忆中信息整合的结果，包括关于感觉和各种记忆表征的信息，来自大脑内生存和唤醒回路活动的信息，来自身体反应的反馈。此外，与感知威胁和安全相关的神经通路，包括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轴）、迷走神经和脑膜淋巴管 (Slavich, 2020)等。其中，迷走神经有 80%是传入神经纤维，它的主要功能是将感觉信号从内脏器官传至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帮助调节压力水平并促进心理安全感的产生 (Porges, 2007; Porges & Furman, 2011)。

3.2 心理安全感的遗传基础：易感性受体基因

面对不同的环境，个体的感受性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当个体携带的可塑性等位基因越多，对环境的影响就更敏感 (Belsky & Pluess, 2009)。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5 -羟色胺转运基因

（5HTTLPR）、催产素受体基因、α2B 肾上腺素受体基因（ADRA2B）等特定等位基因携带者对环境更加敏感，相应的，他们也更加容易受环境影响而产生心理不安全感。以依恋安全为例，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 NR3C1 甲基化（Glucocorticoid Receptor Gene NR3C1 Methylation）是一个类似的易感性因素。研究表明，NR3C1 甲基化程度高的孩子，如果暴露在压力情境下，依恋焦虑的可能性会增加 (Bosmans et al., 2018)。催产素受体的特定基因位点（如 OXTR rs2254298）已被发现与婴儿的依恋行为存在关联。尤其在非白种族的婴儿中，研究表明，携带催产素受体基因的特定 A 等位基因（the A allele of OXTR *rs2254298*）的婴儿，其依恋安全感表现得更为明显 (Chen et al., 2011)。同时，携带催产素受体基因位点（OXTR *rs53576*）特定等位基因（GG/AG）的个体，对来自社会环境的输入表现出高度敏感性，特别是对情感支持寻求的文化规范 (Kim et al., 2010)。此外，携带 5HTTLPR 短等位基因的个体更容易对环境和个人经历产生敏感，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 (Starr et al., 2013)。另外，α2B 肾上腺素受体基因也是一个压力易感性基因。研究发现，在压力条件下，α2B 肾上腺素受体基因缺失突变携带者在观看情绪面孔时杏仁核激活程度显著高 ADRA2B 基因非缺失突变携带者，但在控制条件下二者差异并不显著 (Li et al., 2015)。而杏仁核的过度激活可能会削弱个体的情绪控制能力，使携带风险/易感基因的个体在面对消极环境时容易出现心理或行为问题。一项研究测试了不同基因携带者的被试在执行赌博任务时的脑电活动 (Glazer et al., 2020)，发现比起不携带 DRD4-7R/2R 的人，携带 DRD4-7R/2R 的被试在获得奖励和遭受损失时，奖励正性（Reward-Positivity）以及 frontal-P3 这两个事件相关电位的变化幅度明显更大。这表明携带 DRD4-7R/2R 基因的个体更敏感地感知和反应奖励，更有能力在获得奖励时集中注意力，可能解释了他们为何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更容易接受和认同自己所处文化的规范与价值观。总之，生物、环境与心理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某些先天的生物因素可能导致个体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心理安全感处于更高或者更低的水平。

3.3 心理安全感的近端因素：个体经历与生物基因的交互

个体早期环境经历和社会环境构成了心理安全感的近端因素。个体与环境动态交互变化 (Lazarus & Folkman 1987)，环境为个体提供了一个反馈循环，以确定处境的安全性 (Wanless, 2016)。在早期，家庭、学校是儿童活动和交往最重要和直观的微观系统，依恋风格、家庭氛围、童年创伤等经历强烈地影响了心理安全感。在家庭环境中，不安全依恋史导致对心理安全的线索敏感性增加，经常负面感知他人的情绪，而安全依恋的个体即便被排斥后也倾向于合作 (Fang et al., 2014)；良好的家庭关系，积极和谐的亲子关系代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和接受，爱和温暖促进了心理安全感，然而，父母的高度控制会带给孩子心理不安全感，增加冲突 (Selçuk et al., 2020)。童年创伤历史与成年后的焦虑、抑郁相关(Hovens et al., 2009)，负面影响身心健康 (Oral et al., 2016)。这些早期经历修饰了大脑发育的精细结构，从身体因

素(如营养)到社会心理因素(如家庭稳定性、社会经济地位、压力逆境、社会规范等)，影响我们生活的众多环境因素在大脑中得到整合 (Farah, 2017)。在生命的前两年，随着大脑的整体发育，脑沟褶内皮层的数量也增加 (Gilmore et al., 2018)。到 2 岁时，大脑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架构似乎已经基本形成，2 岁以后大脑发育的主要特征是重组、微调和重塑已经建立的大脑回路和神经网络。

人类基因组的社会敏感性最终源于社会条件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对安全与威胁的感知的能力 (Dickerson & Kemeny, 2004)。社会环境过程通过激活中枢神经系统过程，影响身体周围的激素和神经递质活性，调节了人类基因的表达，影响基因对社会环境的反应敏感性 (Cole, 2009)。表观遗传（Epigenesis）是指基因与环境输入持续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改变了基因在心智、大脑和行为中的表达方式，环境输入影响了基因的表达，导致了神经系统和行为的改变。研究表明，童年期的不良经历可能破坏了 HPA 轴的基因的正常功能，导致皮质醇反应变得迟钝且压力应对能力减弱 (Brodsky, 2016)。这些早期的环境因素与生物学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塑造了个体冲动悲观等易感性的心理特征。此外，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环境也持续不断对大脑进行修饰和影响。例如，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教育、邻里关系）影响大脑的发育 (Brito & Noble, 2014; Farah, 2017; Rakesh & Whittle, 2021)。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儿童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往往从照顾者和家庭环境中体验到较少的语言、社会和认知刺激。研究发现，家庭中语言刺激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异与左半球支持语言的皮质区域的发育差异有关。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会感觉到更多的压力，压力带给海马、杏仁核、前额叶皮质区消极的影响。这些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影响了大脑的发育，并表现为个体在语言、信息处理、记忆、认知结构上的差异 (Brito & Noble, 2014)。

由此可见，在同一群体中，经族群早期生存环境筛选的遗传基因以及个人发展经历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个体在面对特定文化情境中的生活事件时的生理激活度和应对方式不同，进而产生了心理安全感的群体内差异。

4 心理安全感的群体间差异：环境、文化、基因的相互作用

心理安全感不仅仅是个体的经验，同样也是集体的经验 (Jacobson & Bar-Tal, 1995)。自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方式以来，就按照一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来组织他们的群体，这些行为模式也受到生存形式的限制。生存环境、基因、行为模式不断交互，表现出性格、心理现象的地域差异。心理安全感的群体差异同样是三者交互的结果（图 3）。我们结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来解析心理安全感群体差异的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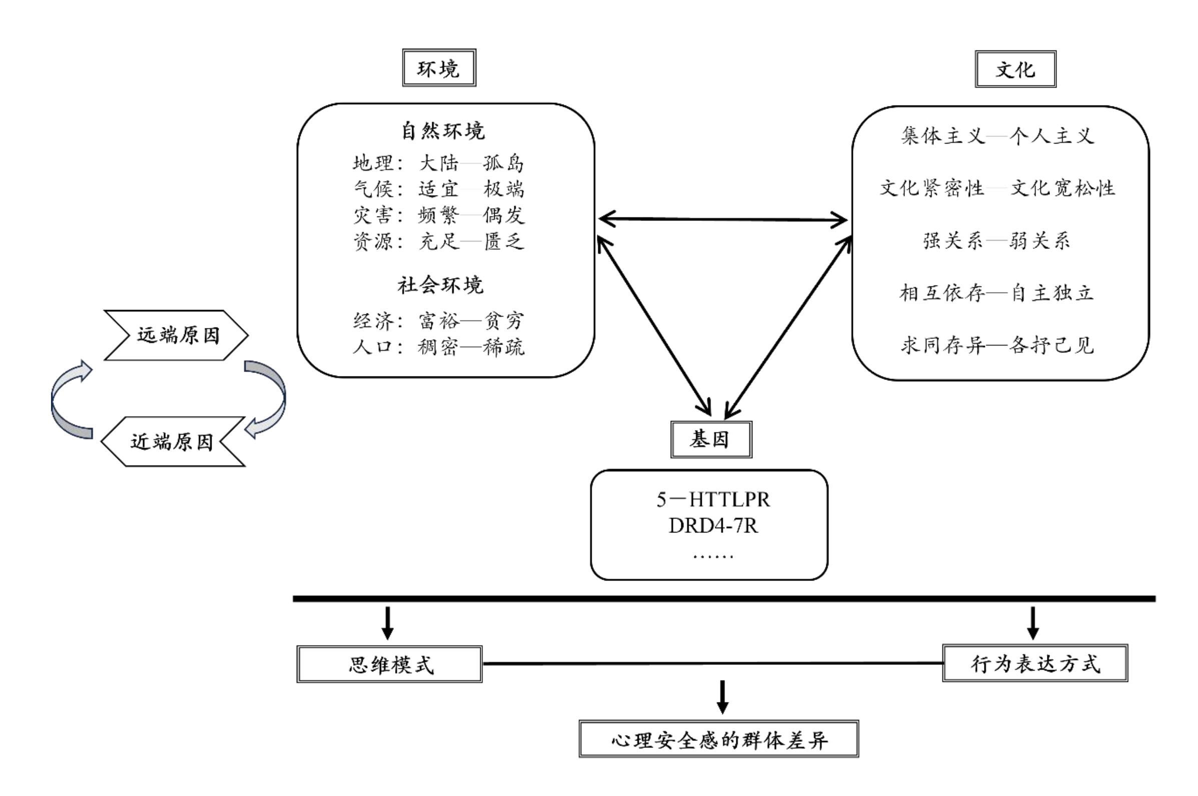


图 3 心理安全感的群体间差异及其产生机制

图注：在群体间，群体演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文化适应性，以及群体成员的基因，相互交织，互为影响。这三者的差异性推动了不同群体的成员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从而显现出心理安全感的群体层面的多样性。这些元素既是心理安全感产生的远端原因，通过人类群体演化过程形成，同时也可以视为近端原因，影响着群体成员对新环境的适应程度。

4.1 环境与基因的互动

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如地形、气候等）以及社会环境特征（价值观、文化等）影响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促成了人格特质、心理现象在空间地理上的聚合（Clustered）(Rentfrow, 2014; Rentfrow, 2020)。这种环境与基因的互动，也导致了心理安全感的地理差异。例如，Wei 等人调查了中国和美国多个地区气候与性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与生活在恶劣气候地区的人相比，生活在更温和地区的人具有更高水平的外向性、宜人性和开放性，以及更低的神经质 (Wei et al., 2017)。因为作为温血动物，人类追求接近心理与生理最舒适的生存环境。温和的气候给人们提供了心理安全感，提供了更多的户外探索和社交机会，影响了人格特质的发展；相比之下，当环境温度太热或太冷时，人们不太可能外出。这与依恋理论相一致，即当个体在心理上感到安全时，他们更有可能探索环境 (Bowlby, 1982; 1969)。同样，Camperio Ciani 等通过一系列研究(Camperio Ciani, 2017; Camperio Ciani et al., 2007; Camperio Ciani & Capiluppi, 2011)调查了在意大利岛屿上居民的人格特征。他们发现，与内陆人相比，岛民的外向性和开放性水平较低，情绪稳定性和责任心水平较高，而那些离开岛屿的移民有更高水平的外向性和开放性。结合生态位和基因流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

低外向性和开放性，高情绪稳定性和责任心的特征能够很好地适应孤岛的社会生态位，而不适应的个体将离开种群，导致岛屿基因库中影响外向开放的等位基因逐渐流失。随着持续的隔离，岛屿居民的性格特征将向最适应孤立环境的方向转变。基因流（遗传物质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以及适应特定的社会生态位的遗传过程使岛内岛外居民产生了人格差异(Rentfrow, 2014)。此外，对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在侵略和暴力方面的差异，依据人类气候、攻击和自我控制模型 (Van Lange et al., 2017)，人们对各种当地的适应性，反映在生命史策略、时间取向和自我控制的差异上，并造成了人们在暴力和攻击性方面的差异。具体而言，较低的温度，尤其是较大程度的气候季节性变化，要求个人和群体采取较慢的生命史策略，更关注未来，更注重自我控制，由此抑制了攻击和暴力行为，相应的，生活在该环境的人们，心理安全感的水平也相对更高 (Van Lange et al., 2017)。

4. 2 基因与文化的互动

近年来，学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来解释文化与基因之间的互动作用。文化神经科学综合了文化心理学、神经科学、遗传学的理论和方法，旨在探究心理、神经、基因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并揭示这些过程及其性质之间的双向关系 (Chiao, 2018；Kim & Sasaki, 2014) 。生态位构建理论强调生物体具有改变自然选择的能力，从而引导自身和其他物种的进化过程。人类生态位的形成受到一种独特的、强大的、累积的文化知识基础的决定(Laland et al., 2010)。神经—文化交互作用模型（Neuro-Culture Interaction Model）认为通过反复参与文化实践，以及长期处于某种文化中，有助于形成新的神经通路或者文化模式下的大脑活动。这进一步促使大脑模式能够自发地、无缝地执行与该文化相关的行为 (Kitayama & Uskul, 2011)，造成不同种群之间的心理差异和行为差异。依据文化与基因的协同进化理论 (Boyd & Richerson, 1988; Laland et al., 2010)，文化驱动我们的大脑与身体沿着特定的方向进化，塑造了人类的基因。大脑与心智活动是文化和遗传协同进化的结果。当某种文化特征具有适应性时，基因选择就可能导致负责这些文化能力储存和传播的认知和神经结构的改进，从而产生心理与神经生物学上的适应性。

文化与基因之间的互动循环，造成了易感性基因在不同文化下的分布差异，进而造成心理安全感的群体差异。研究揭示了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等位基因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 5 -羟色胺转运基因（5-HTTLPR）这一易感性的受体基因，在“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文化维度下出现的频率有很大的差异。比起个体主义文化（欧洲样本），集体主义文化（东亚样本）更有可能包含携带 5-HTTLPR 短（S）等位基因的个体 (Chiao & Blizinsky, 2010)。这种基因的差异导致了人们行为表达的差异：携带较多短（S）等位基因的个体可能对消极词汇和图片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偏好，而携带较多长（L）等位基因的个体则倾向于积极认知偏好（注：(S)14 倍重复序列的短等位基因；(L)16 倍重复序列的长等位基因）。

同样，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文化也改变了基因。多巴胺 D4 受体 DRD4-7R 基因与新奇寻求、多动个性有关，携带 DRD4-7R 基因型（7-Repeat Variation of Dopamine Receptor D4，DRD4-7R）的个体总体来说更加具有冒险精神 (Chen et al., 1999)。研究表明，DRD4-7R 基因在世界各地人群中分布的总体趋势与人类祖先的迁徙经历相吻合：从人类发源地非洲开始，人类所经过的迁徙路程越遥远，该人群中携带 DRD4-7R 的比率就越高。在欧洲和中东的人群中，DRD4-7R 基因的携带率大约是 10%～25%；而从非洲起源迁徙到南美洲亚马孙盆地的当地土著人群中，DRD4-7R 基因携带率大约是 70%。高 DRD4-7R 基因携带率记录了人类祖先伟大的迁徙历史 (Chen et al., 1999; Ding et al., 2002)。此外，集体主义文化下，人群中携带 DRD4-7R 基因的比例更低。这是由于集体主义文化要求个体整齐划一，而携带 DRD4-7R 基因的个体表现出的不安分特点与集体主义文化格格不入，最终在集体主义文化的压力下，DRD4-7R 基因被淘汰。此外，亚洲人更加文化互依性而欧美人更加独立性，研究表明 DRD4-7R 或 2R 调节了独立或者互相依存的文化。比起非携带者，DRD4-7R 或 2R 的携带者表现出文化主导的社会取向，对环境或社会文化的影响更加具有可塑性，更可能支持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 (Kitayama et al., 2014)。另外，相比于欧洲裔美国人，东亚人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更强的倾向，更愿意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一项研究通过检测大脑中与人际交往和心智推理相关的脑区——颞顶联接区（TPJ）的灰质体积（GM），来探究这种文化差异是否在大脑结构上有所体现。结果显示，东亚人的右侧 TPJ 灰质体积比欧洲裔美国人更大。并且这种文化差异在携带 DRD4-7R/2R 的个体中表现得更为显著，那些携带 DRD4-7R/2R 的东亚人和欧洲裔美国人，他们在 TPJ 灰质体积方面的文化差异更为明显 (Kitayama et al., 2020)。

除了上述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相互依存—自主独立的差异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还表现在思维习惯、价值观等方方面面。以辩论为例，辩论在西方被广泛接受并视为一种自然的表达方式，而在东方文化中，如中国和亚洲地区，辩论并不普遍。西方北美的人们几乎从幼儿园开始接受阐述和论证的教育和训练，他们更加关注事物本身，并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在沟通与决策中，他们倾向于各抒己见。相比之下，东方文化中的观念强调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个体自我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个人的价值和意义需要通过群体和社会角色来定义。在这种观念下，激烈的讨论像辩论这样的形式可能会威胁到人际和谐，因此，在东方文化中，人们更倾向于减少冲突，求同存异达成共识 (Nisbett, 2003)。此外，东亚人倾向于以一种更全面的方式处理视觉信息，关注视觉的周围以及中心物体；而西方人则倾向于以分析的方式处理视觉信息，更关注中心的物体而非周围物体 (Nisbett & Miyamoto, 2005)。

4.3 环境与文化的互动

Yamagishi 和 Hashimoto (2016)的研究认为，人类是社会生态位的构建者，通过创造性的行为和决策来适应和改变社会环境，而制度建设是社会生态位建设的核心，制度激励或抑制了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行事，人们也通过遵守制度来最大化适应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特定形式的社会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特定心理机制）具有防御功能，那么这些行为（以及潜在机制）更有可能成为适应环境的更普遍的文化特征 (Fincher et al., 2008)。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社会规范、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文化的构建、传承和演变也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环境，保护自身安全。以文化价值观为例，研究认为，面对严酷的经济和自然环境，巨大的心理威胁更可能导致人们倾向于采纳集体主义或优先保护群体的价值观。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观点。与环境不那么恶劣的地方相比，在气候条件苛刻、自然资源有限的地方，人们表现出更多集体主义价值观 (Van De Vliert, 2013)；同样，自然灾害风险较高的地方比风险较低的地方更具集体主义 (Oishi & Komiya, 2017)；病原体的区域流行与集体主义的文化指标有很强的正相关，与个体主义有很强的负相关 (Fincher et al., 2008)。因为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人们需要采取规避风险策略，把安全放在首位，而集体控制和隔离的方式可以很好地保护自身。此外，一项涵盖了 85 个国家以及 15 个中国省份的研究，探讨了三种气候经济环境（Climato-Economic Habitats）及其相应的社会和心理模式，研究显示：在受高温威胁的贫困人口中，自由程度最低，因为恶劣的环境以及匮乏的经济使他们的选择与行动受到限制；在受温和气候影响的人口中，自由程度居中；而在受高温威胁的富裕人口中，自由程度最高，因为人们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探索创造，应对苛刻的环境条件，保证生活质量，他们的选择与行为也更具自由 (Van De Vliert et al., 2013)。这表明环境、经济的差异带给人们不同程度的心理安全感，同时也使人们构建出与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相比之下，集体主义的文化可以来抵御严酷的环境，协调不充足的资源。

环境与文化相互交织，社会规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心理安全感的群体差异。社会规范的强度以及对越轨行为的制裁程度，可以用“文化紧密性-松散性”（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来描述 (Gelfand et al., 2006)。文化紧密性的国家对越轨行为有严格的社会规范约束和较低的容忍度，而文化松散性的国家对越轨行为有较宽松的社会规范和较高的容忍度 (Gelfand et al., 2011)。文化的松紧度同样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对 33 个国家以及美国 50 个州的调查显示，相比之下，在面临高度威胁（如自然灾害、资源匮乏、传染疾病、威胁冲突、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有着更强的文化紧密性，公民表现出更强的谨慎、冲动控制和自我监控的能力。因为面对威胁，强有力的规范和对越轨行为的低容忍，有助于协调生存的社会行动。比较而言，威胁较低的地区有更灵活的规范，可以容忍更多的不受限制的行为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文化紧密性的地区有更高的社会稳定水平，更低的犯罪率，更低的毒品和酒精使用，更低的无家可归率和更低的社会混乱 (Harrington & Gelfand, 2014; Gelfand et al.,

2021)，这样的环境象征着更高水平的心理安全感。COVID-19 流行期间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截至 2020 年 10 月，遵守严格规范的国家（文化紧密性的国家：日本、中国、新加坡）比那些不严格规范的国家（文化宽松性的国家：美国、巴西、意大利）在限制 COVID-19 病例和死亡人数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据估计，文化松散度高的国家的病例数是文化紧密度国家的 4.99 倍，死亡人数是 8.71 倍 (Gelfand et al., 2021)。严格遵守社会规范使人们在大规模群体实现协调一致，共同应对集体威胁并增强心理安全感。

总之，在群体中，自然及社会环境、文化适应、群体中个体的基因，三者相互作用，彼此影响。这三方面的差异引发了不同群体的成员在思维模式和行为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心理安全感的群体间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存在于人类时间轴上影响群体心理安全感的远端原因，而且也可以作为近端原因，影响人们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性，而选择性迁移是造成性格或心理现象在地理差异上变化的原因 (Rentfrow & Jokela, 2016)。

5 心理安全感的共性：认知与情感层面的心理安全感

尽管存在着心理安全感在个体以及群体中的差异，但无论个体以及群体如何，仍然存在相似的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能够激活情感、认知和动机系统，这些系统共同作用，有助于促进个体的成长，促进幸福感和亲社会倾向 (Canterberry & Gillath, 2013)。认知与情感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这使人们可能产生相似的感知与理解。我们综合一些研究，我们可以来理解心理安全感的共性机制（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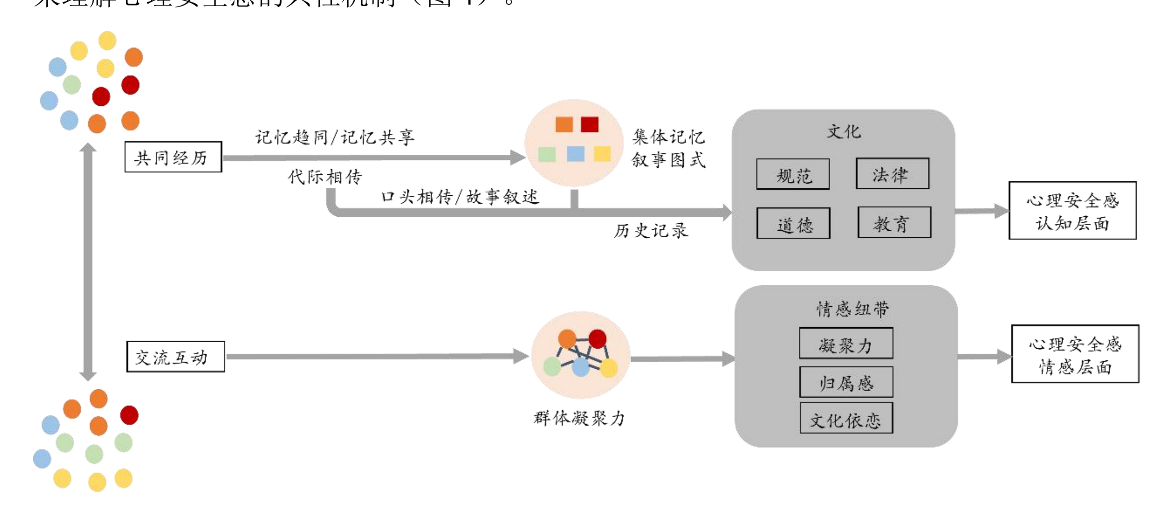


图 4 个体或群体心理安全感的共性机制

图注：不同颜色的圆代表不同的个体，聚集成为群体。群体中，成员的共同经历形成共享的记忆，并随着代际相传逐渐成为集体记忆或叙事图式。保存在历史记录中的集体记忆，随着代际更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符号，为群体成员提供了共享的框架和意义，用于理解环境并产生认知层面的心理安全感。与此同时，积极的群体交流和互动紧密联系了群体成员，培养了归属感、凝聚力和文化依恋等情感纽带，从而产生了情感层面的心理安全感。

群体的安全感是指成员在集体中感到安全和受到保护的程度。共同的负面经历和情绪是维系关系的主要来源，也是群体凝聚力和身份认同的基石 (Spoor & Kelly, 2004)。在人类早期，人们开始以各种规模的群体聚集在一起，群体成员间的共同经历（抵御自然灾害、防御野兽攻击、合作狩猎等），在群体中广泛分享，在交流中动态构建，在社会演化中，通过口头传统、故事叙述、历史记录等方式代代相传，成为群体或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和共享的记忆体系——集体记忆或叙事图式。集体记忆不仅可以改变个体的认知，而且能够唤起个体的群体意识 (Reese & Fivush, 2008)。

在群体生活在，为了减少物质和社会环境方面的不确定性，更有效地保障个体和集体的生存 (Christopoulos & Tobler, 2016)，人们必须找到一个共享的意义系统。那些保存在历史记录中的集体记忆，随着代际更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符号，社会规则、习俗、法律，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化（文化元素或文化表征）是特定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共享和习得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McNeeley & Lazrus, 2014)，赋予成员共享的框架和意义去理解环境。文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同时为群体中的社会成员提供了认知安全感（Sense of Epistemic Security）。一方面，文化、社会和个人相互交织，文化赋予个人意义感，进而促进社会内部的协调与融合 (Chao et al., 2015)。文化通过规范和制度来约束对社会具有破坏性的行为，维护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维护控制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协调。另一方面，文化的共享性赋予个体认知安全感。个体获取并内化了文化价值观、规范等文化知识，使个人能够适应社会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 (Chao et al., 2015; Fu et al., 2007)。当制度规范被公民信任时，增强了人们的心理安全感，促进了与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 (Spadaro et al., 2020)。

文化提供的安全感不仅仅在认知上，也延伸到情感领域 (Chao et al., 2015)。文化具有情感价值，在群体成员之间代代相传，成为个体建立情感依恋的安全基础，为个体提供情感支持和保护。文化依恋，是个体与文化群体之间的情感联系，给个体带来安全感 (Hong et al., 2013; Yap et al., 2019)。例如，驻派海外的士兵在制服下面贴身携带着国旗，象征着情感性的文化依恋。最后，同一社会中的成员拥有相似的文化表征，这种共享的知识文化有助于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 (Rohner, 1984)。

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密切了群体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在互动中，感受到他人的支持、理解和认同，与他人共享目标、价值观和文化，群体的凝聚力，对群体的归属感进一步加强。群体的互动提供了社会认同的渠道，使个体感受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感受到更强的心理安全感。Baumeister 和 Leary（1995）认为，人类具有一种普遍的动机，即形成和维持至少一定数量的持久、积极和重要的人际关系。这种动机根植于我们祖先的遗传背景，并贯穿于我们的思维、情感和行为之中。归属感和认同感则是这种动机的核心要素，渴望建立社会联系和寻求归属感的驱动力是人类本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塑造个体的社交互动

和经验具有核心的推动作用。此外，群体提供的集体资源和协作机制也为个体提供了安全感的来源。个体在群体中的互动还可以通过建立信任和安全的社会氛围来增强安全感。这些都促进了情感层面的心理安全感。

因此，集体记忆、文化符号赋予成员共享的框架和意义，用于理解环境并产生认知层面的心理安全感；而与群体积极的互动形成的归属感、凝聚力、文化依恋等情感纽带，带来情感层面的心理安全感。文化及情感纽带的作用，使不同的个体、群体，以相似的机制获得心理安全感。

6 人类发展视角下心理安全感理论框架的应用

6.1 心理安全感在身心健康中的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维持较高的心理安全感的诸多好处已经得到了证明。心理安全感对身心健康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Diener et al.,1999)。在生理健康方面，较高的心理安全感能够缓解压力，维持身体的平衡状态，稳定呼吸和心率，强化免疫力。在心理健康方面，心理安全感是个人心理健康的基础 (Zotova & Karapetyan, 2018)，较高的心理安全感可以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增强情绪调节与问题解决能力，促进情感稳定和心理幸福。当个体拥有较高的心理安全感时，更可能体验到如幸福、满足、乐观等的积极情绪 (Gilbert et al., 2008)。社会进化模型 (Fredrickson, 2001; Fredrickson & Losada, 2005)认为，积极情绪使人们拓宽视野、建立资源和应对逆境，促进身心健康，并且这些益处有持久的影响。

同时，心理安全感为人们提供了各种旨在促进自我和人际关系健康的资源。在个人发展中，心理安全感与个人健康，自尊自信，人际信任以及创造力有关。在团队工作中，心理安全可以视为一种生态资产 (Wanless, 2016)，促进开放沟通，增强团队的合作性与个体的参与感。研究表明，感到心理安全感的人能够表达自我，在工作中发声、创造，将自我概念融入工作中；心理安全通过营造一个使成员感到安全舒适的环境，进而提高团队的效率与成果 (Schulte et al., 2012)；感知到安全可以使人们更愿意尝试，而不担心犯错或者指责，从而促进学习和创新。当个人感受到积极的心理安全感时，重要的日常生活情况可能更容易优化。

另一方面，较低的心理安全感会导致心理健康问题，例如缺乏控制感觉会增加虚幻错觉的感知，甚至使个体看到不存在的意向（幻视、幻听），感知到阴谋 (Whitson & Galinsky, 2008)。而当个体在缺乏控制后感到心理安全时，他们不太容易产生虚幻错觉。这种安全感的有益影响常被用在心理治疗中，让来访者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控制感，以减少对他人无害行为的过度解读。再如，较低的心理安全感会导致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沉溺于虚拟世界以弥补在现实生活中缺乏的心理安全感 (Jia et al., 2017; Young et al., 2011)。而心理需求在现实中的得到满

足的人，网络成瘾的概率更小（邓林园 等, 2012），这表明增强心理安全感可能有助于戒除网瘾。

6.2 心理安全感的识别、维护与提升策略

个体的心理特征常常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相应地，心理安全感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Chopik, 2023)。几项研究显示，中国大学生心理安全水平随时间的变化呈下降趋势 (Xin et al., 2022; Zhang & Zhao, 2023)。跨文化的研究也揭示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带给民众心理困扰与心理不安全感 (Marzo et al., 2021)。当前的现实形势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忽视心理安全感的重要性，并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心理安全感下降的趋势。而要采取必要措施，首先得较为精准的识别不同个体与群体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安全感水平，此时基于人类发展的心理安全感理论框架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1）精确识别关注对象的心理安全感水平。如前所述，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安全感受到个体发展与群体发展的交互影响。心理咨询师或心理卫生工作者在面临来访对象时，可基于其种族或家族的文化背景及个体发展经历评估其在特定问题环境中的心理安全感水平。例如，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重要生活事件、成长环境、与主要依附对象的关系等都可能对其心理安全感产生影响。同时，人类发展的各阶段，如儿童期、青春期、成年期等，每个阶段都有其特有的发展任务和挑战，这也会对心理安全感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评估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确保识别的结果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针对性，从而为后续的干预提供有效的依据。

（2）融入群体以维护心理安全感。社会认同，体验到与社会群体的联系对身心健康和福祉有积极的影响 (Haslam et al., 2022; Steffens et al., 2017)。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群体对个体心理的塑造取决于个体在自我系统中接纳和融入群体特征的程度 (Turner et al., 1987)，也就是群体认同。群体认同作为社会联系的先决条件，为个体提供了应对挫折、变化和挑战的心理资源，进而增强了个体对信任、归属、安全和支持的感受，影响了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Jetten et al., 2014)。群体成员通过传递信息和给予支持，帮助个体构建自我认知。对群体中自我的身份认同使人们将自己视为集体的一部分，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系，融入到更大的社会网络之中，培养起“存在的安全感”(Jetten et al., 2014)。感知到与群体成员的相似性，预示着共同的动机和安全感，这是群体带来的重要的体验 (Lemay & Ryan, 2021)。在家庭、学校、工作环境中，群体认同、群体归属帮助个体建立了稳固的心理基础，对培养提升心理安全感至关重要。一项名为“GROUPS 4 HEALTH（G4H）”的心理干预方案及其潜在价值初步得到验证，这个由 5 个模块组成的手册化心理干预方案为人们提供了知识和技能，以培养和维护社交团体关系，改善社交孤立或社会脱节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 (Haslam et al., 2016)。

（3）建立支持性的社会人际关系以提升微环境中的心理安全感。社会网络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建立社会联系是人类的基本动机(Baumeister & Leary, 1995)。社会关系使人们接触到广泛、多样化的资源和信息，同时，亲密的社会支持使个体感受到被爱、被关心、被尊重、被重视的体验(Taylor et al., 2004)。通过频繁而密切的互动可以建立起强关系网络，并扩展联系形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群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的联系。具体而言，建立亲密关系（Arriaga et al., 2018)、和谐友好的邻里关系，培养积极的领导者与团队成员关系（London et al., 2023)、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Jia et al., 2017)，通过积极的社会互动，与他人或群体成员建立起信任、合作、互助的关系，来管理利用以及提升心理安全感。

（4）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以提升人们在面对经济、健康和社会风险时的总体心理安全感。建设完善社会娱乐设施，缓解焦虑抑郁水平。缓解社会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建立健全社会服务心理体系。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每个发展阶段的个体都有其特定的需求和挑战。例如，老年人可能更加关心健康和退休保障，而青少年则可能更加关心教育和就业机会。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体系应该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进行设计和调整，确保它们真正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提高人们的心理安全感。同时，考虑到社会的多元化和全球化趋势，应该加强跨文化和跨群体的沟通与合作，促进各种资源的共享与流通，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支持和机会。

6.3 心理安全感的理论框架在富有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多元化与包容性（Diversity and Inclusion，D&I）指的是在组织或社区中承认、尊重并欣赏个体间的差异，同时创造一个环境，使得每个成员都能充分参与并贡献其独特价值(Pless & Maak, 2004; Roberson, 2006)。这种差异可以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身体能力、宗教、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有效的 D&I 策略不仅仅是提高种族、性别或者文化背景的代表性，而是确保所有组织成员都在一个包容性的环境中感到受欢迎、有价值和有影响力(Shore et al., 2011)。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国际化战略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外交领域与世界各地加强交往；另一方面，我国国内不同地域和社会阶层的文化差异也日趋明显，体现出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个体和群体差异（English et al., 2022; Kwon, 2012; 孙庆洲 等, 2023; 廖思华 等, 2021; 管健, 金淑娴, 2019)。在这一背景下，基于人类发展视角的心理安全感理论框架对于创造富有多元化与包容性文化的组织与工作情境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一框架中，理解不同个体和群体在心理安全感结构和功能上的微妙差异，可以指导我们创建更具包容性的环境，以满足不同群体的独特需求和视角以提高适应性、弹性和激发创新，例如：

（1）工作场所的包容性倡议：组织应认识到在心理安全感上的个体和群体的文化差异。这可以通过制定包容性政策来实现，确保所有员工都感到被重视、被听到并感到安全。公司

可以为员工和管理者提供文化能力、潜在偏见和微侵犯的培训，确保每个人都感到心理上的安全。

（2）教育政策的包容性变化：学校和大学应培养尊重并适应学生多元化背景的包容性学习环境。课程应包括多元化的视角，教育工作者应接受文化反应性教育法的培训。学校还可以提供支持学生独特需求的项目和资源，例如为特定人群提供的导师计划、支持小组或资源中心。

（3）医疗卫生与健康领域的服务提升：医疗卫生与健康领域可以利用此理论框架来提供富有文化同理心的医疗服务。健康专业人员应理解，不同的文化与发展背景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心理安全感，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状态甚至是医疗效果。可以开发针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健康促进项目，以增强其心理安全感。

（4）公共政策的精准化落地：政府部门可基于此理论框架实施支持不同文化群体多样需求的政策。这可能涉及努力打击歧视和系统性偏见，创造平等的机会，并确保公平获得资源和服务。

（5）研究者的持续研究与评估：研究人员应基于此理论框架进行持续的研究和评估，了解与不同文化和个人发展背景下的心理安全感相关的多样性经验和需求。这可以指导干预、政策和计划的开发和完善。

通过将这些建议整合到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工作中，研究者和实践者可以更好地预测并满足各种个体和文化群体的独特需求，为我国社会与组织营造更具包容性和心理安全感的环境，最大化的实现人的高质量发展。

7 总结与展望

心理安全感，作为当代社会和组织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其对于人类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本文从人类发展的视角深入探索了心理安全感在个体与群体中的差异与共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心理安全感的识别、维护与提升策略，以及在建设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文化氛围中的重要应用。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和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并对家庭、组织、社会的管理实践起到了积极的参考作用。

然而，面对未来，心理安全感的研究仍然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新的方向。例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社会多元化的深入，如何确保跨文化和跨界别的心理安全感的构建和维护，进一步深入创造多元化与包容的社会与组织文化情境，以吸引和维护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和现代化发展资源，是一个亟待探索的国家战略议题。此外，新的技术和媒体形式如何影响和改变我们的心理安全感，也是值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同时，未来研究也需要考虑到更加复杂的社会背景，如社会不平等、政治动荡、环境变化等，这些都可能对心理安全感产生深远的

影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研究者需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来全面地探讨心理安全感的复杂性。

总之，心理安全感研究的道路仍然漫长而充满挑战。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共同的努力和探索，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心理安全感，并为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更加有效的策略和建议。

参考文献

安莉娟，丛中. (2003). 安全感研究述评.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6*, 98–99.

曹中平，黄月胜，杨元花. (2010). 马斯洛安全感-不安全感问卷在初中生中的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2), 171–173.

丛中，安莉娟. (2004). 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 97–99.

邓林园，方晓义，万晶晶，张锦涛，夏翠翠. (2012). 大学生心理需求及其满足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心理科学*, *35*(1), 123–128.

管健，金淑娴. (2019). 社会困境中合作行为的阶层差异：自我与他人的双重视角. *心理科学*(04),920-927.

廖思华，丁凤仪，徐迩嘉，胡平，胡晓檬. (2021). 从“留学热”到“海归潮”:海归群体反向文化震荡的心理与行为效应. *应用心理学*(03),204-214.

孙庆洲，黄靖茹，虞晓芬，高倾德. (2023).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高、低社会阶层的捐助行为差异. *心理学报*, Online First, 1–23.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1677

Arriaga, X. B., & Kumashiro, M. (2019). Walking a security tightrope: Relationship-induced changes in attachment securit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5*, 121–126.

Arriaga, X. B., Kumashiro, M., Simpson, J. A., & Overall, N. C. (2018). Revising Working Models Across Time: Relationship Situations That Enhance Attachment Secur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2*(1), 71–96.

Bar-Tal, D., & Jacobson, D. (1998).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Security. *Applied Psychology*, *47*(1), 59–71.

Baumeister, R. F., & Leary, M. R. (1995).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7*(3), 497–529.

Belsky, J., & Pluess, M. (2009). Beyond diathesis stress: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6), 885–908.

Blascovich, J., & Mendes, W. B. (2000). Challenge and threat appraisals: The role of affective cues. In J. P. Forgas (Ed.), *Feeling and thinking: The role of affect in social cognition*. (2000-07085-002; pp. 59–8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ascovich, J., Seery, M. D., Mugridge, C. A., Norris, R. K., & Weisbuch, M. (2004). Predicting athletic performance from cardiovascular indexes of challenge and threa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5), 683–688.

Blascovich, J., & Tomaka, J. (1996).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Arousal Regulation. *I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8, pp. 1–51). Elsevier.

Bosmans, G., Young, J. F., & Hankin, B. L. (2018). NR3C1 methylation as a moderator of the effects of maternal support and stress on insecure attachment development.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1), 29–38.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Bowlby, J. (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2*(4), 664–678.

Boyd, R., & Richerson, P. J. (1988).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ito, N. H., & Noble, K. G. (2014).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tructural brain development.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8*, 276.

Brodsky, B. S. (2016).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and Genetic Interactions: The Diathesis for Suicidal Behavior.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18*(9), 86.

Bronfenbrenner, U. (1992).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In R. Vasta (Ed.), *Six theories of child development: Revised formulations and current issues.* (1992-98662-005; pp. 187–249).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Cammett, M., Parreira, C., Kruszewska-Eduardo, D., & Atallah, S. (2022). Commitment to the “National” in Post-Conflict Countries: Public and Private Security Provision in Leban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6*(7–8), 1235–1262.

Camperio Ciani, A. S. (2017). Adaptive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revealed by small island population genetics: Testing the personality gene flow hypothesis. In A. T. Church (Ed.), *The Praeger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cross cultures: Evolutionary,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of personality.*, *Vol. 3*. (2017-33823-002; pp. 31–58). Santa Barbara: Praeger/ABC-CLIO.

Camperio Ciani, A., & Capiluppi, C. (2011). Gene Flow by Selective Emigration as a Possible Cause for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Small Islands and Mainland Popu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5*(1), 53–64.

Camperio Ciani, A. S., Capiluppi, C., Veronese, A., & Sartori, G. (2007). The adaptive value of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revealed by small island population dynam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1*(1), 3–22.

Canterberry, M., & Gillath, O. (2013). Neural evidence for a multifaceted model of attachm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88*(3), 232–240.

Chao, M. M., Kung, F. Y. H., & Yao, D. J. (2015). Understanding the divergent effects of multicultural expos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7*, 78–88.

Chen, C., Burton, M., Greenberger, E., & Dmitrieva, J. (1999).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Variation of Dopamine D4 Receptor (DRD4) Allele Frequencies Around the Glob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5), 309–324.

Chen, F. S., Barth, M. E., Johnson, S. L., Gotlib, I. H., & Johnson, S. C. (2011). Oxytocin Receptor (OXTR) Polymorphisms and Attachment in Human Infan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 200.

Chen, H., Wang, L., & Li, J. (2022). How Can Servant Leadership Promote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 A Moderated Chain Mediation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938983.

Chen, Y., & Baram, T. Z. (2016). Toward Understanding How Early-Life Stress Reprogram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Brain Networks.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41*(1), 197–206.

Chiao, J. Y. (2018). Developmental aspects in cultural neuroscience. *Developmental Review*, *50*, 77–89.

Chiao, J. Y., & Blizinsky, K. D. (2010). Culture–gene coevoluti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7*(1681), 529–537.

Chopik, W. J. (2023). A space-tim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urrent Research in Ecolog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 100085.

Christopoulos, G. I., & Tobler, P. N. (2016). Culture as a response to uncertainty: Foundations of computational cultural neuroscience. In J. Y. Chiao, S.-C. Li, R. Seligman, & R. Turn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al neuroscience.* (2016-08565-005; pp. 81–10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le, S. W. (2009). Social Regulation of Human Gene Express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3), 132–137.

Crick, N., & Dodge, K. (1994).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5*(1), 74–101.

Dickerson, S. S., Gruenewald, T. L., & Kemeny, M. E. (2004). When the Social Self Is Threatened: Shame, Physiology, and Healt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6), 1191–1216.

Dickerson, S. S., & Kemeny, M. E. (2004). Acute Stressors and Cortisol Responses: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Synthesis of Laboratory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0*(3), 355–391.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 Smith, H. L. (1999).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2), 276–302.

Ding, Y.-C., Chi, H.-C., Grady, D. L., Morishima, A., Kidd, J. R., Kidd, K. K., Flodman, P., Spence, M. A., Schuck, S., Swanson, J. M., Zhang, Y.-P., & Moyzis, R. K. (2002). Evidence of positive selection acting at the human dopamine receptor D4 gene locu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9*(1), 309–314.

Dunbar, R. I. M. (2012). The social brain meets neuroimaging.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6*(2), 101–102.

Edmondson, A. (1999).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Learning Behavior in Work Tea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4*(2), 350–383.

Edmondson, A. C., & Lei, Z. (2014). Psychological Safety: The History, Renaissance, and Future of an Interpersonal Construct.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1), 23–43.

Fang, A., Hoge, E. A., Heinrichs, M., & Hofmann, S. G. (2014). Attachment Style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Oxytocin on Social Behaviors and Cognitions During Social Rejection: Applying an RDoC Framework to Social Anxiety.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 A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740–747.

Farah, M. J. (2017). The Neuroscience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Correlat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Neuron*, *96*(1), 56–71.

Feeney, J., & Fitzgerald, J. (2019). Attachment, conflict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Laboratory-based and clinical insight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5*, 127–131.

Fernández, M., Mollinedo-Gajate, I., & Peñagarikano, O. (2018). Neural Circuits for Social Cognition: Implications for Autism. *Neuroscience*, *370*, 148–162.

Fincher, C. L., Thornhill, R., Murray, D. R., & Schaller, M. (2008). Pathogen Prevalence Predicts Human 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Proceedings: Biological Sciences*, *275*(1640), 1279–1285.

Fredrickson, B. L. (2001).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218–226.

Fredrickson, B. L., & Losada, M. F. (2005). Positive affect and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human flourish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7), 678–686.

Fu, J. H., Morris, M. W., Lee, S., Chao, M., Chiu, C., & Hong, Y. (2007). Epistemic motives and cultural conformity: Need for closure, culture, and context as determinants of conflict judg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2*(2), 191–207.

Gelfand, M. J., Jackson, J. C., Pan, X., Nau, D., Pieper, D., Denison, E., Dagher, M., Van Lange, P. A. M., Chiu, C.-Y., & Wang, M.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 and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A global analysis.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 *5*(3), e135–e144.

Gelfand, M. J., Nishii, L. H., & Raver, J. L. (2006). On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1*(6), 1225–1244.

Gelfand, M. J., Raver, J. L., Nishii, L., Leslie, L. M., Lun, J., Lim, B. C., Duan, L., Almaliach, A., Ang, S., Arnadottir, J., Aycan, Z., Boehnke, K., Boski, P., Cabecinhas, R., Chan, D., Chhokar, J., D'Amato, A., Ferrer, M., Fischlmayr, I. C., … Yamaguchi, S. (2011). Differences Between Tight and Loose Cultures: A 33-Nation Study. *Science*, *332*(6033), 1100–1104.

Gilbert, P. (1993). Defence and safety: Their function in social behaviour and psychopath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2*(2), 131–153.

Gilbert, P., McEwan, K., Mitra, R., Franks, L., Richter, A., & Rockliff, H. (2008). Feeling safe and content: A specific affect regulation system? Relationship to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and self-criticism.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3*(3), 182–191.

Gilmore, J. H., Knickmeyer, R. C., & Gao, W. (2018). Imaging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brain development in early childhood.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9*(3), 123–137.

Glazer, J., King, A., Yoon, C., Liberzon, I., & Kitayama, S. (2020). *DRD4* polymorphisms modulate reward positivity and P3a in a gambling task: Exploring a genetic basis for cultural learning. *Psychophysiology*, *57*(10).

González-Carrasco, M., Casas, F., Ben-Arieh, A., Savahl, S., & Tiliouine, H. (2019). Children's Perspectives and Evaluations of Safety in Diverse Settings and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ulti-National Approach.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14*(2), 309–334.

Hall, E. T. (1966). *The hidden dimension, 1st ed* (2003-00029-000). New York: Doubleday & Co.

Harrington, J. R. (2017). *Worlds Unto Themselves: Tightness-Looseness and Social Class* (Ph.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https://www.proquest.com/docview/1939862044/abstract/EB69532F5C064955PQ/1

Harrington, J. R., & Gelfand, M. J. (2014). Tightness–looseness across the 50 united st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22), 7990–7995.

Hart, J. (2014). Toward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Defense.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9*(1), 19–39.

Hart, J., Shaver, P. R., & Goldenberg, J. L. (2005). Attachment, Self-Esteem, Worldviews, and Terror Management: Evidence for a Tripartite Security Syst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8*(6), 999–1013.

Haslam, C., Cruwys, T., Haslam, S. A., Dingle, G., & Chang, M. X.-L. (2016). Groups 4 Health: Evidence that a social-identity intervention that builds and strengthens social group membership improves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94*, 188–195.

Haslam, S. A., Haslam, C., Cruwys, T., Jetten, J., Bentley, S. V., Fong, P., & Steffens, N. K. (2022). Social identity makes group-based social connection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loneliness and mental health.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3*, 161–165.

Hofmann, H. A., Beery, A. K., Blumstein, D. T., Couzin, I. D., Earley, R. L., Hayes, L. D., Hurd, P. L., Lacey, E. A., Phelps, S. M., Solomon, N. G., Taborsky, M., Young, L. J., & Rubenstein, D. R. (2014). 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for studying mechanisms of social behavior.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9*(10), 581–589.

Hong, Y., Fang, Y., Yang, Y., & Phua, D. Y. (2013). Cultural Attachment: A New Theory and Method to Understand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6), 1024–1044.

Hovens, J. G. F. M., Wiersma, J. E., Giltay, E. J., Van Oppen, P., Spinhoven, P., Penninx, B. W. J. H., & Zitman, F. G. (2009). Childhood life events and childhood trauma in adult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anxiety and comorbid disorders vs. controls: Childhood trauma and adult psychopathology.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122*(1), 66–74.

Jacobson, D., & Bar-Tal, D. (1995). Structure of Security Beliefs among Israeli Stude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16*(3), 567.

Jetten, J., Haslam, C., Haslam, S. A., Dingle, G., & Jones, J. M. (2014). How Groups Affect 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 Path from Theory to Policy: Groups, Health, and Well-Being.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8*(1), 103–130.

Jia, J., Li, D., Li, X., Zhou, Y., Wang, Y., & Sun, W. (2017).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deviant peer affiliation as mediators betwee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3*, 345–352.

Kim, H. S., & Sasaki, J. Y. (2014). Cultural Neuroscience: Biology of the Mind in Cultural Context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1), 487–514.

Kim, H. S., Sherman, D. K., Sasaki, J. Y., Xu, J., Chu, T. Q., Ryu, C., Suh, E. M., Graham, K., & Taylor, S. E. (2010). Culture, distress, and oxytocin receptor polymorphism (OXTR) interact to influence emotional support seek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36), 15717–15721.

Kitayama, S., King, A., Yoon, C., Tompson, S., Huff, S., & Liberzon, I. (2014). The Dopamine D4 Receptor Gene (*DRD4*) Moderates Cultural Difference in Independent Versus Interdependent Social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6), 1169–1177.

Kitayama, S., & Uskul, A. K. (2011). Culture, Mind, and the Brain: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2*(1), 419–449.

Kitayama, S., Yu, Q., King, A. P., Yoon, C., & Liberzon, I. (2020). The gray matter volume of the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varies across cultures: A moderating role of the dopamine D4 receptor gene (*DRD4*).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5*(2), 193–202.

Kraus, L., Wechsung, I., & Möller, S. (2017). Psychological needs as motivators for security and privacy actions on smartphone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Applications*, *34*, 34–45.

Laland, K. N., Odling-Smee, J., & Myles, S. (2010). How culture shaped the human genome: Bringing gene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together.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1*(2), 137–148.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7). Transac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on emotions and cop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3), 141–169.

LeDoux, J. E. (2017). Semantics, Surplus Meaning, and the Science of Fear.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1*(5), 303–306.

Lemay, E. P., & Ryan, J. E. (2021).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Perceived Similarity, and Communal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7*(6), 985–1003.

Lemerise, E. A., & Arsenio, W. F. (2000). An Integrated Model of Emotion Processes and Cognition in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hild Development*, *71*(1), 107–118.

Li, S., Weerda, R., Milde, C., Wolf, O. T., & Thiel, C. M. (2015). ADRA2B genotype differentially modulates stress-induced neural activity in the amygdala and hippocampus during emotional memory retrieval. *Psychopharmacology*, *232*(4), 755–764.

London, M., Volmer, J., Zyberaj, J., & Kluger, A. N. (2023). Gaining feedback acceptance: Leader-member attachment style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33*(2), 100953.

Maddux, J. E., & Rogers, R. W. (1983). Protection motivation and self-efficacy: A revised theory of fear appeals and attitude chang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5), 469–479.

Marzo, R. R., Ismail, Z., Nu Htay, M. N., Bahari, R., Ismail, R., Villanueva, E. Q., Singh, A., Lotfizadeh, M., Respati, T., Irasanti, S. N., Sartika, D., Mong, P., Lekamwasam, S., Thapa, B. B., Kucuk Bicer, B., Aye, S. S., Songwathana, K., El-Abasiri, R. A., Ahmad, A., … Su, T. T. (2021).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uring pandemic Covid-19 among adult general population: Result across 13 countries. *Clinical Epidemiology and Global Health*, *10*, 100708.

Maslow, A. H. (1942). The dynamics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insecurity. *Character & Personality; A Quarterly for Psychodiagnostic & Allied Studies*, *10*, 331–344.

Maya-Vetencourt, J. F., & Origlia, N. (2012). Visual Cortex Plasticity: A Complex Interplay of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Neural Plasticity*, *2012*, 1–14.

Mayr, E. (1961). Cause and Effect in Biology. *Science*, *134*, 1501–1506.

McNeeley, S. M., & Lazrus, H. (2014). The Cultural Theory of Risk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Weather, Climate, and Society*, *6*(4), 506–519.

Melanie, C. (2011). *What underlies security? Neurological evidence for attachment's resource enhancement role*(2012-99040-184; Issues 8-B). ProQuest Information & Learning.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17). An attachment perspective on compassion and altruism. In P. Gilbert (Ed.), *Compassion: Concept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017-21071-011; pp. 187–202). New York: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Mikulincer, M., & Shaver, P. R. (2019). Attachment orientation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5*, 6–10.

Mobbs, D., Headley, D. B., Ding, W., & Dayan, P. (2020). Space, Time, and Fear: Survival Computations along Defensive Circuit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4*(3), 228–241.

Neuberg, S. L., & Schaller, M. (200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s): Evolution, stigma,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9*(5–6), 6–6.

Nisbett, R. E. (2003).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 and why* (pp. xxiii, 263). New York: Free Press.

Nisbett, R. E., & Miyamoto, Y. (2005).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percep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9*(10), 467–473.

O'Connell, L. A., & Hofmann, H. A. (2011). Genes, hormones, and circuits: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behavior. *Frontiers in Neuroendocrinology*, *32*(3), 320–335.

Oishi, S., & Komiya, A. (2017). Natural Disaster Risk and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8*(8), 1263–1270.

Oosterhoff, B., Palmer, C. A., Wilson, J., & Shook, N. (2020). Adolescents' Motivations to Engage in Social Distanc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ssociations With Mental and Social Health.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7*(2), 179–185.

Oral, R., Ramirez, M., Coohey, C., Nakada, S., Walz, A., Kuntz, A., Benoit, J., & Peek-Asa, C. (2016).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trauma informed care: The future of health care. *Pediatric Research*, *79*(1–2), 227–233.

Pedersen, M. J., & Favero, N. (2020). Social Distancing during the COVID -19 Pandemic: Who Ar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Noncompli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0*(5), 805–814.

Pless, N., Maak, T. Building an Inclusive Diversity Culture: Principles, Processes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54*(2), 129–147 (2004).

Porges, S. W. (2007). The polyvagal perspective. *Biological Psychology*, *74*(2), 116–143.

Porges, S. W., & Furman, S. A. (2011).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provides a neural platform for social behaviour: A polyvagal perspective.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20*(1), 106–118.

Rakesh, D., & Whittle, S. (2021).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developing brain – A systematic review of neuroimaging findings in youth.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130*, 379–407.

Reader, S. M., & Laland, K. N. (2002). So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and enhanced brain size in prim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99*(7), 4436–4441.

Reese, E., & Fivush, R. (2008).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Memory*, *16*(3), 201–212.

Rentfrow, P. J. (2014).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In P. J. Rentfrow (Ed.), *Geographical 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13-14629-007; pp. 115–137).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Rentfrow, P. J. (2020). Geographical psychology.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32*, 165–170.

Rentfrow, P. J., & Jokela, M. (2016). Geographical Psychology: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6), 393–398.

Roberson, Q. M. (2006). Disentangling the Meanings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in Organizations.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31*(2), 212–236.

Rogers, R. W. (1975). A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of Fear Appeals and Attitude Change1.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91*(1), 93–114.

Rohner, R. P. (1984). Toward a Conception of Culture for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5*(2), 111–138.

Sallet, J. (2022). On the evolutionary roots of human social cognition.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137*, 104632.

Sandel, A. A., Miller, J. A., Mitani, J. C., Nunn, C. L., Patterson, S. K., & Garamszegi, L. Z. (2016). Assessing sources of error in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primate behavior: Intraspecific variation in group size and the social brain hypothesi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94*, 126–133.

Sander, D., Grafman, J., & Zalla, T. (2003). The Human Amygdala: An Evolved System for Relevance Detection. *Reviews in the Neurosciences*, *14*(4), 303-316.

Sangha, S., Diehl, M. M., Bergstrom, H. C., & Drew, M. R. (2020). Know safety, no fear.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108*, 218–230.

Schulte, M., Cohen, N. A., & Klein, K. J. (2012). The Coevolution of Network Ties and Perceptions of Team Psychological Safety. *Organization Science*, *23*(2), 564–581.

Selçuk, Ş., İşcanoğlu, Z., Sayıl, M., Sümer, N., & Berument, S. K. (2020). Factors Influencing Children's Appraisals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The Rol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1*(11), 2022–2044.

Shore, L. M., Randel, A. E., Chung, B. G., Dean, M. A., Holcombe Ehrhart, K., & Singh, G. (2011).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in Work Groups: A Review and Model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37*(4), 1262–1289.

Slavich, G. M. (2020). Social Safety Theory: A Biologically Based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Life Stress, Health, and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6*(1), 265–295.

Slavich, G. M. (2022). Social Safety Theory: Understanding social stress, disease risk, resilience, and behavior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beyond.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5*, 101299.

Spadaro, G., Gangl, K., Van Prooijen, J.-W., Van Lange, P. A. M., & Mosso, C. O. (2020). Enhancing feelings of security: How institutional trust promotes interpersonal trust. *PLOS ONE*, *15*(9), e0237934.

Spoor, J. R., & Kelly, J. R. (2004). The 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of Affect in Groups: Communication and Group Bonding.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7*(4), 398–412.

Starr, L. R., Hammen, C., Brennan, P. A., & Najman, J. M. (2013). Relational Securit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Polymorphism (5-HTTLPR) on Stress Gener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41*(3), 379–388.

Steffens, N. K., Haslam, S. A., Schuh, S. C., Jetten, J., & Van Dick, R. (2017).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Health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1*(4), 303–335.

Stevens, M., & Merilaita, S. (2009). Animal camouflage: Current issues and new perspective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4*(1516), 423–427.

Szechtman, H., & Woody, E. (2004).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s a Disturbance of Security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11*(1), 111–127.

Tashjian, S. M., Zbozinek, T. D., & Mobbs, D. (2021). A Decision Architecture for Safety Computations.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5*(5), 342–354.

Taylor, S. E., Sherman, D. K., Kim, H. S., Jarcho, J., Takagi, K., & Dunagan, M. S. (2004). Culture and Social Support: Who Seeks It and W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3), 354–362.

Tinbergen, N. (1963) On aims and methods of ethology. *Zeitschrift für Tierpsychologie*, 20, 410-433. This journal was renamed Ethology in 1986.

Turner, J. C., Hogg, M. A., Oakes, P. J., Reicher, S. D., & Wetherell, M. S.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1987-98657-000).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Van De Vliert, E. (2013). Climato-economic habitats support patterns of human needs, stresses, and freedom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6*(5), 465–480.

Van De Vliert, E., Yang, H., Wang, Y., & Ren, X. (2013). Climato-Economic Imprints on Chinese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4), 589–605.

Van Lange, P. A. M., Rinderu, M. I., & Bushman, B. J. (2017). Aggression and violence around the world: A model of CLimate, Aggression, and Self-control in Humans (CLASH).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0*, e75.

Wang, J., Long, R., Chen, H., & Li, Q. (2019). Measuring the Psychological Security of Urban Residents: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New Scal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2423.

Wang, X. T., Kruger, D. J., & Wilke, A. (2009). Life history variables and risk-taking propensity.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0*(2), 77–84.

Wanless, S. B. (2016).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in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13*(1), 6–14.

Wei, W., Lu, J. G., Galinsky, A. D., Wu, H., Gosling, S. D., Rentfrow, P. J., Yuan, W., Zhang, Q., Guo, Y., Zhang, M., Gui, W., Guo, X.-Y., Potter, J., Wang, J., Li, B., Li, X., Han, Y.-M., Lv, M., Guo, X.-Q., … Wang, L. (2017). Regional ambient temperature is associated with human personality. *Nature Human Behaviour*, *1*(12), 890–895.

Whitson, J. A., & Galinsky, A. D. (2008). Lacking Control Increases Illusory Pattern Perception. *Science*, *322*(5898), 115–117.

Xin, S., Sheng, L., Liang, X., Liu, Y., & Chen, K. (2022). Psychological security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2006–2019: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hange on the declining trend.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18*, 70–79.

Yagil, D., & Luria, G. (2010). Friends in Nee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Under Low-Safety Climate.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35*(6), 727–750.

Yamagishi, T., & Hashimoto, H. (2016). Social niche construc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119–124.

Yang, Q., Shi, M., Tang, D., Zhu, H., & Xiong, K. (2022). Multiple Roles of Gri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of College Freshme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824214.

Yap, W.-J., Cheon, B., Hong, Y., & Christopoulos, G. (2019). Cultural Attachment: From Behavior to Computational Neuroscience.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13*, 209.

Young, J. E. (1999). *Cognitive therapy for personality disorders: A schema-focused approach, 3rd ed* (1999-02395-000). Sarasota: Professional Resource Press/Professional Resource Exchange.

Young, J. E., Klosko, J. S., & Weishaar, M. E. (2003). *Schema therapy: A practitioner's guide* (2003-00629-000). Guilford Press.

Young, K. S., Yue, X. D., & Ying, L. (2011). Prevalence estimates and etiologic models of Internet addiction. In K. S. Young & C. N. de Abreu (Eds.), *Internet addiction: A handbook and guide to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2010-22949-001; pp. 3–17).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Inc.

Zhang, H., & Zhao, H. (2023). Changes in Chinese adolescent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ecurity during 2004–2020: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95*(4), 631–646.

Ziv, Y., & Hadad, B. S. (2021). Understanding the mental roots of social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s: An integrated information-processing perspective. *Heliyon*, *7*(2), e06168.

Zotova, O., & Karapetyan, L. (2018).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s the foundation of personal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alytical review). *Psychology of Russia: State of Art*, *11*(2), 100–113.

（通讯作者：尹彬 E-mail：byin@fjnu.edu.cn）

作者贡献声明：

韩书：论文的全文撰写、修订与完善；

尹彬：提出研究命题与思路，提供研究资源，指导论文撰写、修订与完善。

The Difference and Commonality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i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sights from the Hum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HAN Shu & YIN Bin*

(School of Psycholog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

*Corresponding Email: byin@fjnu.edu.cn

***Abstract*:** People commonly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against potential dangers to achieve a sense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Psychological security refers to the anticipation of potential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threats and is a state of mind manifested through cognition, emotion, behavior, and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security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psychology,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public health,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 However, its role in human develop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evolutionary history have been under-explored. This paper, by examin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delves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from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individual, and group perspectives. Specifically, genetic factors combined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s result in varied individual responses and coping mechanisms to stressful events. Between groups, the interplay of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genetics leads to differences in thought and behavior patterns, inducing group-level variances in psychological security.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re pivotal to shaping psychological security. Shared cultural symbol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provide a common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one's environment, fostering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security. Meanwhile, positive group interactions and the resultant feelings of belonging and cohesion fortify emotional psychological securit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psychological security comprehensively and discusses its relevance in various domains lik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family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iming to bolste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nhanc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and promote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for the civil society.

***Keywords*:** Psychological Security; Human Developm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roup Differences; Diversity and Inclusion